

評介邵式柏著，林偉盛等譯， 《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 （1600-1800）》^{*}

林欣宜^{**}

邵式柏（John Robert Shepherd）著，林偉盛等譯，《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上、下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6月。704頁。

壹、前言

2016年中出版的邵式柏《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一書，是臺灣史學界遲來的盛事。1993年由美國的史丹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原著，在經過20餘年後，幾位臺灣史專家於公忙之餘，耗費多年合作翻譯，才終於得以出版，可見得此書之受重視。但其如此晚面世，導致康豹在〈推薦序〉云：「迄今未能發揮應有的影響力」。¹

^{*}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8年1月8日；通過刊登日期：2018年2月7日。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¹ 見康豹，〈推薦序〉，收入邵式柏（John Robert Shepherd）著，林偉盛等譯，《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上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6月），頁III。

自邵式柏的英文專書正式出版後，國內外已有不少書評、介紹，皆普遍論及本書的學術價值與貢獻，在於提出「清代前期對臺治理，乃考慮戰略成本、稅收及開支平衡的政治經濟之結果」，成功地對「（平埔族）流離說」（displacement scenario）和「（清政府）消極治臺說」（neglect hypothesis）加以批判。由此而起，引領出對施添福提出的「國家剝削論」及柯志明主張的「族群政治說」等臺灣史詮釋上之重大爭論，邵式柏的論點因而被定位為「理性國家說」。² 諸多書評作者對於本書內容已有深入討論，其研究之貢獻亦無庸置疑，本文不再錦上添花。相對地，筆者想由一個現職大學臺灣史教師與研究者的立場，來談談這本書在問世將近25年後的現在，對臺灣史學界之意義。

貳、教學現場的清代臺灣史及其問題

現在的大學生入學前都讀過臺灣史，他們乃自1997年《認識臺灣（歷史篇）》讓臺灣史正式進入臺灣中學教育體系後的新世代。學生早已知悉清代臺灣史（1683-1895）被訴說的重要主題：漢人渡臺開墾、熟番流離及其土地流失、政府建置、動亂械鬥、消極治理、開港通商、積極建設等。在我任教的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一年級必修課程「臺灣通史」的清代部分，在近幾年經常為所有單元中最不討喜者，原因一來是相對於17世紀歷史富有異國情調，熱鬧活潑有朝氣，與19世紀中期以後的積極進步、繁榮現代，被清朝政府統治的中間一大段，

² 針對此書之評論非常多，以下僅茲舉數篇代表。中文方面有潘英海，〈平埔族研究的困惑與意義：從邵式柏的博士論文「十七及十八世紀臺灣拓墾中的漢番關係」談起〉，《臺灣風物》，第37卷第2期（1987年6月），頁157-165；張隆志，〈歷史人類學與西文臺灣史研究的里程碑：評介邵著《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臺灣史研究》，第1卷第2期（1994年12月），頁150-155等；英文學界則有David Ownby, “Reviewed Work(s):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by John Robert Shepher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1 (Feb. 1994), pp. 177-178; R. Bin Wong, “Reviewed Work: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by John Robert Shepherd,” *T'oung Pao*, vol. 81, Fasc. 1/3 (1995), pp. 192-194; Donald S. Sutton,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by John Robert Shepher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xviii plus 596pp. \$65.00),”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28:4 (Jul. 1995), pp. 914-917, etc.

就好像開始進入悠長的黑暗時代，只有「無趣」一詞可形容。就我近年教學經驗所得的觀察，大致有以下3點原因：

一是學生對於臺灣各地歷史一再重覆「移民·開發·建置」過程，感到厭煩。細究其實，學生不見得對臺灣早期歷史的「移民·政府·原住民」三角關係引發的重要歷史問題不感興趣，而是在歷史教育中一再重覆簡化而不深入的說法，使他們對於「在清政府消極治理下的漢人和番地關係」、「土地與租佃」等重要課題，總只在門口打轉，感到不耐煩。一位學生形容內容經常：「有頭有尾沒過程，即使是高中生，也懂得要說清朝對臺消極治理，應該將清朝統治臺灣的前後做比較，要不就應該將清朝統治的所有領土做比較。」換言之，對學生而言，清代臺灣史的內容似乎過於想當然爾地簡化一段複雜的過程。

二是學生們對於臺灣史號稱以多元族群與文化為特色，十分強調族群互動，在清代臺灣史卻往往只呈現原住民單向地被改變（即一般俗稱漢化）的過程，像是命中註定一樣，用學生的話說：「課本中的內容讓人覺得平埔族遲早會消失殆盡」。

第三是對於「臺灣主體歷史」的困惑，學生們雖然可以理解不屈從於中國民族主義，由臺灣人民的立場來講述臺灣的歷史，並強調人親、土親的認同感，是臺灣史的基調，但卻使臺灣史走向孤立化、特殊化，沒有充分說明臺灣與中華帝國及周邊相同立場的邊疆地帶的關係。這說明了現行教科書展現的臺灣史脈絡，對學生而言，並非不證自明之理。

從筆者近年教學經驗可以感覺到，現階段臺灣歷史論述的發展，面臨了殘酷的挑戰，過去30多年來臺灣社會經歷的民主化，使民主、自由、反威權的價值觀成為社會共識，而本土化的浪潮也刺激了臺灣史的壯大。在這些新思潮影響下的臺灣學生，才剛讀懂歷史乃「現在和過去的不斷對話」，³又要面對1990年代自海外席捲而來，劇烈影響人文學界的後現代解構、解殖思潮。一般而言，他們也大多贊同「從民族國家之框架拯救歷史」⁴的重要性。學生們一方面要努力吸收

³ 來自1960年代初卡耳（E. H. Carr）提出的重要史學論點。見愛德華·卡耳著，江政寬譯，《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⁴ 此為杜贊奇（Prasenjit Duara）重要論點。見杜贊奇著，王憲明等譯，《從民族國家拯救

並跟上後現代史學種種論點，另一方面卻又要學習20世紀初期國族主義建構下，強調吾輩先祖「葦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漢族中心主義引領的「唐山過臺灣」論述，豈能不精神錯亂？

叁、邵式柏一書的架構與研究方式及其意義

邵式柏的《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從政府治理的角度出發，探究在臺各政權如何面對「迅速擴張且難以駕馭的邊疆社會」衍生的決策過程，以便究明「封禁」與「弛禁」之間的光譜，與在此社會變化中平埔族群的角色。⁵ 這本書雖然在2016年才出中文版，但書中諸多討論反映的其實是對於1970年代至80年代的歷史議題的批判、同時也師承施堅雅（G. W. Skinner）、武雅士（Arthur Wolf）和馬若孟（Ramon Myers），強調區域空間體系分析與社會中的人群、經濟和宗教體系的問題式研究取向而來。

從此書的寫作架構來看，全書12章，共1,633個註腳，另有56幀圖表，6篇附錄則各自討論一個足以構成小型考證之文章，可見作者下的功夫之深。全書研究上的重點，乃為第3部的9至11章「邊疆地佃制度的調和」，用以討論熟番地權、番屯制度與平埔族群的轉變，突顯清朝統治臺灣社會的邊界政策手段，並以平埔族群文化轉變之個案，檢視政策之效果，在結論處兼與中國南北邊疆狀況做比較。

那麼在這之前的1至8章為何而寫、還龐大到足以分成兩部呢？由第1部2至5章「平埔族群與漢人入侵的最早期階段」及第二部6至8章「清朝封禁政策與漢人移民擴大」內容來看，兩部分別側重原住民（第1部）及漢人移民及政府（第2部），依序由17世紀早期的臺灣與原住民生活開始介紹起，接著由荷蘭人及鄭氏陸續來臺、漢移民遷臺，討論其各自在臺行政管理，如何延續至清朝統治初期；

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

⁵ 見邵式柏，〈中文版序〉，《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上冊，頁XVIII、XVIX。

第2部則開始討論清政府對臺封禁政策及漢人移墾與地方官府財政問題。這兩部共達8章的內容，由其所具背景說明之性質來看，可能是作者為了深入研究清朝治臺之番界政策、土地關係與平埔族群轉變，所做的基礎準備工作。結果，因為先行研究不足以回答，當時作者僅能依賴臺灣銀行出版的一系列臺灣文獻叢刊及日本時代調查的資料，自行整理分析，而有了針對平埔族群村社位置、稅額、人口、以及漢人移民數量、地稅及米穀計量等等統計資訊，其中有部分可能因為規模過大而移往附錄。

邵式柏批判的論點，即臺灣平埔族群的消失，包括他們的處境、歷史變化、土地權利等，被歸咎於清朝的消極統治。他透過綿密地梳理政策制定過程，說明了從康熙、雍正到乾隆朝中葉之間政策之波動及其考量，證明了清朝政府「並非不理性」地統治臺灣，所以為防臺而治臺，並不一定就是消極對待，他定位臺灣在清政府整體統治中具有「戰略邊陲」（strategic periphery）的地位，並用滿洲及中國西南的例子，說明其他邊疆地區也考慮其戰略定位與收支平衡來制定政策，清朝政府對各地決定的過程乃經過「成本與效益之計算」（cost-benefit calculus）。對現在的學生來說，「成本考量」並不難理解，甚至，或許可以說，被稱為「崩世代」的他們，比起其他世代有更切身的需要理解「成本如何作為行動之前提」。

因此，由現下臺灣社會情勢來看，今日這本書對臺灣史的價值，不只在他書中的結論，而應該是其研究方法。這一部嚴格來說30多年前（出版20餘年）的作品，至今仍有3點值得我們重視的地方，正為上一節所述3點歷史教育中臺灣史論述病灶的良方：

首先是由概念及分期回答問題的研究方式：有鑑於以往臺灣史突顯清朝治臺之「流離說」與「忽略說」，卻無視仍有不少平埔族群仍存在漢人主要移住的臺灣西部平原、並保有土地一事，邵式柏視為歷史解釋上相互矛盾而應回答的問題。他運用「統治理性」作為評估政治與經濟兩個歷史重要面相的概念，作為此書研究的出發點，比較能公平地對待清代臺灣歷史裡的3個行動者：清政府（指不同層次的決策權力核心代表的官僚體系，有時被上綱為「國家」）、漢人移民和原住民。

另外，有別於國內一般討論臺灣史的分期方式將1860年代的開港與社會變化（尤其是動亂械鬥等較平息）視為分段點，邵式柏以1600-1800為討論時限，顯然用的是世界史上定位為「近代初期」（early modern）的一段，對應清代的初期和前期，此時期的領土及人口擴張特性，使控制迅速成長的邊疆社會，成為政府的重要課題。強調清代臺灣史中前半期時間段，雖明顯排除19世紀起的近代時期（modern），就臺灣史發展的性質與作者討論內容而言，用全球史分期的時間框架，更能精準地限定討論對象於臺灣島上的3個行動者，避開19世紀以後加重的外國因素及急遽的政治經濟變動帶來的近代性轉變。

第二點是邵式柏秉其人類學專業，對於不同文化人群接觸的衍生意涵，能有更細緻的解釋。在這幾年的清代臺灣史研究中，成長最快速的或許是對原住民歷史變遷的解釋。相較於前此的主流「漢化」解釋，邵式柏提出了清朝政府將臺灣視為戰略邊陲，而屢屢對其治臺政策調整，在這大環境過程中原住民的變化，應區分「認同的改變」與「文化的改變」兩個面向；也不應該忽略漢移民在臺落地生根的過程中，同樣有這兩個方向的改變。這樣的觀點是在原住民或漢移民本身資料相對缺乏的狀況下，較公允地評判他們社會生活變化的方式。

第三則是比較的重要性。他揚棄「中央——邊陲（core vs. periphery）」這種暗喻政治上中央政府統治地方的控制力遞減的單一視角，開始討論多元的「治理」模式，在本書中比較臺灣和滿洲及中國西南，也在附錄中比較美國開發的歷程。在比較的方法上，他強調的重點或許可謂為「科學的可比較性」，因此十分重視統計數字與圖表，以臺灣為討論個案，用人口統計、稅額、地方行政規模等，不斷在清帝國中定位其位置，為的是了解一個帝國政府如何治理統治範圍廣大、又各具不同特性與歷史的地方。臺灣和滿洲與中國西南比較，可以解釋的便是清朝政府為何介入原住民土地權利之保護。

較特別的是，他也比較臺灣和北美兩地在殖墾開發上的類似性。以前，不少臺灣學者覺得邵式柏這一部分的書寫不倫不類，像是為與美國就業市場妥協而製造出的生硬對比。但是，若在今日，在學術界國際化交流的要求下，肯定大受歡迎。臺灣與北美可比較的項目，從拓殖與新舊住民的磨合、治理者的角色，到人數較多的移民建立之「社會」如何改變原來社會型態等，都可以成為重要的研究

視角，帶出有意義的歷史比較課題。由後見之明看來，愈是大膽、跨域的比較，或許愈可為臺灣歷史書寫帶來全新的視野。正因為除了時間段相近外完全不相干，要進行比較與討論，勢必得用廣泛共通的概念或問題做為主題，邵式柏要回答的或許是他在美國學術界經常被問到的問題：究竟清代臺灣歷史發展的特殊性或意義何在？也就是說，邵式柏要呈現，臺灣不是一個孤立獨自發展的地域，而是在特定政治經濟時空架構下的一個完整可供其他學術討論的個案。也因此，邵式柏此書最重要的貢獻之一，還包括了將臺灣帶往國際學術討論的場域，讓臺灣的例子成為理解清代中華帝國邊疆治理的重要典範，進而與其他區域對話，在近年來新清史的討論中，臺灣的課題也已經發揮參照的效果。⁶

肆、結語

這本近25年前的書，在資料上或問題上都有其「時代性」。清代臺灣史的地方史料，整體而言，十分不均衡。舉例而言，地方志集中出現於17世紀末至18世紀中，這之後到19世紀末之間則鮮少刊行。⁷ 此種資料屬性的時間限制與地區性，使得臺灣北、中、南各區域，都存在資料上的空白時段。在邵式柏的書寫中也看得出造成某些地方有隔靴搔癢的侷限性，例如用臺灣北部三峽的例子來說明番大租存在一事，便不得不利用日本時代的調查資料，說明18世紀中葉乾隆年間的政策影響；他用埔里地區的平埔族來描繪族群文化的轉變，是本書用以提出重要論點的具體案例，但他們又並非前述具有番大租、被保存了生計的平埔後代。因此，論證對象在時間和空間上不連續，可能是本書的一大弱點，儘管也是非戰之罪。

邵式柏本人也早在書中對此研究的優劣及未來發展方向自我剖析，在新材料

⁶ 例如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一書便用不小篇幅討論臺灣例子。見米華健著，賈建飛譯，《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原書1998年由史丹福大學出版。

⁷ 吳密察，〈「歷史」的出現〉，收入黃富三等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展望》（臺北：中央研究院臺史所籌備處，1997年），頁1-21。

日益增加的狀況下，未來他認為應該開始突破官方材料的限制，對個別原住民部落或番社進行更深入的內部變遷討論；也應該開始追蹤移民從原居地中國東南沿海到臺灣的過程，以便說明臺灣各地移民階段；現在也到了應該更多方考慮臺灣以外邊疆治理及官員經歷、甚至整理國家政策走向的地步，官方政策與實際落實的過程，都應該再繼續深入。

但即使過了這麼多年，邵式柏一書為清代臺灣史建立翔實的基礎，從政府體制、決策過程中的成本與效益、軍事考量和地方社會實際土著與移民互動關係等種種層面，都留下具體研究成果，在近幾十年歷史學界尤重單篇研究論文，缺乏重量級學術專書的狀況下，這一本書因其簡明、全面、易懂、具有深度與思考，反而是清代臺灣史大學教科書的不二選擇。就如張隆志在推薦序中所言，本書成功挑戰清代臺灣史的常識，帶來了比較觀點、問題意識、周全地考慮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各種可能關係，筆者認為應該更進一步期許這本書成為清代臺灣史的常識！